

梁方仲

經濟史

稿文集

中華書局

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

梁方仲著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仇正偉

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

梁方仲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1⁵/₁₆。印張·1插頁·494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1800冊

統一書號：11018·1508 定價：10.70元

ISBN 7-101-00238-2/K·103



梁方仲先生像

選編說明

一、梁方仲(1908—1970)教授是我國著名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專家。編輯出版《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是爲了更好地保存老一輩史學家的寶貴學術成果,方便研究者參考,以利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二、本文集是從作者生前著述的論文中挑選出在各方面專題研究上富有創見的十八篇代表作編輯而成。文章的編排是按發表的時間先後爲序。

三、編入本文集的論文,凡發表後經作者修訂過的,即以修訂的文字爲準;對於原來在排印方面的錯字、漏字、漏句等,也都盡可能作了校正。

四、作者在論文中的注釋,絕大多數是用書的全名,但有時在行文中用簡稱。例如把《天下郡國利病書》簡寫爲《郡國利病書》、《續文獻通考》簡寫爲《續通考》、《明會典》簡寫爲《會典》等,請讀者注意。

五、本文集的選編工作得到老一輩社會經濟史專家陳岱蓀、嚴中平、湯象龍、李文治、谷霽光、羅爾綱、彭澤益、彭雨新、汪敬虞等同志的親切關懷和熱情指導;湯象龍、李文治爲文集寫了序言;中華書局仇正偉同志也爲文集的出版工作付出了艱巨的勞動。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謝意!

六、本文集的整理和具體選編工作是由中山大學歷史系黃啟臣副教授負責的,最後由湯明樾教授審定。由于水平不高,缺乏經

驗，選編工作的缺點和錯誤，在所難免，敬望讀者批評指正。

編者一九八七年一月

序

方仲先生是我國從事經濟史研究工作的一位傑出的學者，特別是在明代經濟史方面有顯著的成就。他編著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是研究中國經濟史一部十分重要的工具書，為教學和研究中國經濟史和各朝代的經濟史提供了不少最基本的統計資料。這裏發表的《經濟史論文集》是他四十年經過披荆斬棘、精心研究明代千百種書籍得來的成果，回答了明代經濟史研究中許多十分重要的問題。

方仲先生于1930年清華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立志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並先從明代經濟史入手。在清華大學研究院三年的學習中，他是經常得到大學同學吳晗同志的鼓勵和支持的。他在治學上是有宏偉氣魄和精密計劃的。他選擇了明代經濟史為他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戰略計劃的第一步，而在明代經濟史的範圍內，他抓住明代田賦制度這個重點研究，進而以一條鞭法為一個突破點。這種研究策略從大處着眼，小處下手，同時在步驟上又由點到面，逐步展開的研究方法是道道地地的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

一條鞭法是研究明代經濟史和明代田賦制度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經濟從二三千年的實物經濟進入貨幣經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方仲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傾注了不少精力，為弄清田賦由征實物改征銀兩問題，認定這是當時貨幣制度的一個重大發展，要弄清這個重大發展，就必須弄清明代的銀的生產和銀元的來源，因

而深入研究明代的銀礦和明代的國際貿易和銀的輸出入，作者深知一條鞭法的推行不僅是二三十年來田賦制度上的一個重大改革，更是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經濟的一個大變化，從此中國封建經濟進入了晚期階段。

方仲先生對明代田賦制度本身作過不少調查研究，如對戶帖、黃冊、易知由單都寫了專門論文，這是作者治學嚴緊和負責的態度。他的論文每篇都有它的意圖，每篇都有它的新的內容，每篇都有它的價值，決不是東剽西竊，人云亦云。

方仲先生是一個讀書萬卷的學者，勤於作筆記，善於收集資料，並善於運用統計方法分析和綜合資料，這是每個從事經濟史工作者所應學習和效法的。

方仲先生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共不過四十年，為中國史學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從中國經濟史事業的需要來說，可惜他在世的時日太短了。他的宏偉的願望沒有完成，1970年“四人幫”的殘酷迫害把他的生命奪走了。後之來者必將認識到方仲先生的著作留芳百世，“四人幫”的罪惡遺臭萬年！是為序。

湯象龍

1983.11.21 於成都。

嚴謹的學風 卓越的貢獻

——《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序言

李文治

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文集，它凝結着梁方仲先生畢生的心血和才華。

梁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發表了大量學術論著，不僅對所專研的某些具體歷史問題提出了不少精辟創見，而且在人們很少涉及的某些領域作了艱辛的開拓工作。他治學嚴謹，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為我們樹立了良好學風。

梁先生的研究工作，涉及方面較廣，其突出貢獻在於明代賦役制度的研究，如關於一條鞭法、糧長制、黃冊、魚鱗圖冊、里甲制度、易知由單、戶貼制等問題的研究，晚年更從事於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的綜合研究。他在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早已為國內外歷史學界所推重。

梁先生研究一條鞭法歷時最久，用力甚勤。他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可以說做了不可磨滅的開創和奠基工作。過去人們一提到一條鞭法，往往把它和梁先生的名字相聯繫，這不是偶然的。

明代一條鞭法的推行，由開始到結束，不僅拖延的時間長，而且各個地區採取了不同的變通形式，頭緒紛繁，難以掌握，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梁先生從大量分歧繁雜的文獻資料中，抽象出規律性的內涵，進行綜合概括，使讀者對一條鞭的內容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

按照梁先生論述，一條鞭法主要是徭役制的改革。徭役由力差改爲徵銀，這種變化本身就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變化。改革徭役制又影響于農民田賦負擔的變化，減少了無地少地農民的差徭負擔。梁先生從以上兩方面的變化入手，探究了一條鞭法改革的實質。

在一條鞭法沒有實行以前，田賦按田畝計算，差徭按戶丁及該戶丁所占田畝編訂均派。對農民來說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負擔。實行條鞭法，各個地區通過不同的形式按丁、地兩項分攤徭銀，將徭役的一部分或全部課之于土地。分攤辦法因時因地而不同，梁先生將之歸納成爲四種形式：一、以丁爲主以田爲輔；二、以田爲主以丁爲輔；三、按丁田平均分攤；四、徭銀完全由田地承擔。在四者之中，後者只在明代後期在個別地區實行過，而前三種占居主要地位。這種歸納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其實是經過大量勞動，參閱大量文獻資料尤其是地方志書而得出的結論。在實行條鞭法以前，徭銀雖然有一部分由土地承擔，但所占比重很小。實行條鞭法後，徭銀之由戶丁負擔的部分大爲縮小，由土地承擔的部分顯著增加。如明人曾經指出的，由田畝承擔的“徭役加派日益月增”。由這種變化說明條鞭法已具有由戶丁稅向土地稅過渡的內涵。但它不同于此後清代的“攤丁入地”，因爲明代按田畝攤派徭銀之外，人丁還承擔部分徭銀，這是條鞭制和清代“地丁制”僅存的一點界限。梁先生所說條鞭法是現代田賦制度的“開始”，就是指它具有“攤丁入地”的因素，指開始向“攤丁入地”過渡。條鞭法的實行，各地在時間上參差不齊，由開始到結束，只持續了百年左右，有的地區只實行了幾十年，在整個賦役史上壽命是短暫的，條鞭法變革本身也說明它的過渡性。把條鞭制作爲一種過渡形式進行考察，是梁先生在學術方面作出的一個貢獻。

梁先生關於一條鞭法研究的創見還反映對於條鞭法推行原因和作用的分析。梁先生指出，條鞭制產生原因首先是土地兼併和人口流動。就是說，它是階級矛盾激化的產物。在未行條鞭法以前，所實行的以里甲制為核心的徭役制，是以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廣泛存在、地權比較穩定為條件的。以後伴隨着階級矛盾激化與地權集中，使原來的徭役制失去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迫使封建國家不能不考慮調整賦役制度以適應變化了的經濟關係。梁先生還指出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作用，無疑這是促使賦役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條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實行條鞭法所導致的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奴役關係的削弱，如梁先生一再指出的，條鞭法出現以前所推行的黃冊制度、里甲制度、徵派差徭的三等九則制等，都是以暴力強制為條件的。歷史事實很清楚，與這種制度相聯繫，是封建國家對廣大農民的強制勞役和人身壓迫。條鞭法推行以後，一切徭役改折銀兩，逐漸把徵派差徭的重心轉向土地，國家遂逐漸放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這標志着農民一定程度的解放。早在解放以前，關於條鞭實行的原因和作用的分析，就能提出這種看法，是難能可貴的。

梁先生對明代糧長制的研究也同樣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糧長制的研究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課題。為鑽研這個問題，梁先生參考了大量文獻資料，從互相歧異的記載中掌握了它的發生發展過程。如關於糧長制由永充、輪充到朋充制的演變，這種演變各個地區在時間上參差不齊，互相交錯；如關於裁糧歸里、糧里合併的發展過程，這種變化由開始發生到結束，延續了兩百多年。糧長制的這種發展演變過程本身就極其複雜難辨，而且還夾雜着其它種種因素，這就更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困難。梁先生針對分歧複雜的記載，條分縷析，不但予讀者以清晰的印象，並且糾正了過去由于記載含混

而在人們頭腦中長期存在的某些誤解。

梁先生對明代中後期糧長性質變化的研究也很值得注意。朱明開國後的六十年間，糧長這一職務，主要由當地首富——大地主擔任，當時糧長權勢炫赫，橫霸一方，帶有“半官”性質。有的還得承皇帝詔見，授予官職，因此當時地主多以充當糧長為榮。明代中後期，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糧長由永充制改為輪充制和朋充制，一般農民皆得充當，這是一個大變化。糧長充當者既由地主改為一般農民，與此相適應，糧長職位的性質也在發生變化，由“半官”性質變成為對農民的封建徭役。梁先生在這方面的剖析極為深刻。

梁先生關於明代中葉前糧長職責的分析也超越了前人。這時糧長除要完成一個糧區的秋糧（主要是漕糧和白糧）的催徵、經收和解運這一主要任務之外，還參與丈量土地、編造魚鱗冊籍、勸誡農民耕種、監督糧戶納糧當差等等。洪武年間，甚至指令糧長檢舉地方上不法官吏和橫霸頑民。在有些地區，糧長還兼有聽訟理獄的權力。這時的糧長制，就其職責性質而言，如梁先生所論證的，超出了單純徵收稅糧的任務，而在起着維護封建統治的基層政治組織的作用。

以上僅就本文集主要內容，即有關一條鞭法及糧長制方面的研究，作了簡要介紹。至如對於明代魚鱗圖冊、黃冊、戶帖、易知由單及里甲制等在解放前很少人作系統深入研究的課題，梁先生也做了難鉅的開拓工作，而且多有創造性的建樹。梁先生對各個具體經濟制度的研究成果，加深了我們對整個明代社會經濟狀況的認識和瞭解，因而在經濟史學領域裏有着深刻的影響。

值得提及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梁先生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態度和工作方法。

早在抗日戰爭以前，梁先生於一九三四年曾經同當時部分史學工作者發起成立史學研究會，明確提出要“隨時代的進步”撰寫“適合時代要求”的作品；主張歷史著作應該是“敘述社會的變遷，經濟的變化，和文化的進步”；同時提出研究歷史要以“整個民族和各民族的發展為主體”。梁先生在歷史研究方面所持的這種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當時史學界要求進步的思潮和初步的唯物主義史觀。

解放以後，梁先生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力求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解釋歷史。梁先生在中山大學講授中國經濟史時，曾經這樣說過：“掌握經典著作的真義就是攀登高峯。只有登上了這個高峯，研究歷史才能極目千里，全景在望”。他針對當時流行的把經典作家說過的每一句話簡單化為貼標籤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強調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研究某一問題時，在理論方面要求努力做到掌握有關該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為了運用馬克思的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基本原理來分析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經濟發展規律，梁先生曾根據英譯本重新翻譯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部分。從此也可以看出他對經典著作嚴肅認真的態度。梁先生在他的論著中雖然很少直接引用經典作家的語錄，但從他在解放以後所發表的論著（如前面所談到的關於一條鞭及糧長制的研究）中，他相當注意運用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進行分析。

在科研工作中，梁先生堅持嚴謹學風，強調實事求是，反對主觀臆斷。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求掌握大量歷史資料，進行仔細分析。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我因從事明代農民戰爭及清代漕運史的研究，曾和梁先生朝夕相處。在多次探討中，給我留下

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歷史問題的處理及資料的搜集工作那種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對當時有些文章不是把論點建立在積累大量堅實可靠的資料的基礎上，動輒做想當然的推論，是持不苟同態度的。他經常談到，要注意詳審辨別資料，所作論斷要有充分根據而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要求別人這樣作，他自己在這方面更是躬行實踐。他的論著所有重要論點，都是根據大量資料並經過慎重考慮而作出的。他從不脫離資料而進行漫無邊際的推測和主觀臆斷。

梁先生治學嚴謹還反映於對待古籍記載的態度，解釋力求準確。譬如有一次，在審訂資料時，有一句話可以做兩種不同的解釋。爲了弄清哪一種解釋比較穩妥，他查閱了大量書籍，並和同事進行研討，然後作出判斷。凡涉及有關財經的典章制度、名物、術語，必查閱羣書，詳加考訂，務求弄清其真實含義和全部內容，從不望文生義。他對自己寫的文稿，在發表以前總是一再推敲和修改，甚至對待每一個標點符號都十分注意。他對待科研問題的這種嚴肅認真的態度，很值得學習。

古書記事，用語每多含混不清，遇到這種情形，梁先生從不輕易放過，必經過詳細考訂，力求做出確切答案而後已。以有關糧長制的研究爲例，據《明會典》卷二十九，“洪武四年，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爲率，設糧長一名，專管其鄉賦稅”。洪武《實錄》所載畧同。讀者每據此論證設置糧長乃天下之通制。其實不然，設糧長主要是長江流域有漕各省，有很多省都不曾設置糧長。所謂“以萬石爲率”一語亦欠確切，大糧區在萬石以上，很多糧區只數千石、數百石乃至百餘石。梁先生爲了考釋糧長制推行地區及每糧區徵運糧額，對地方志書廣爲涉獵，糾正了在史學界廣爲流行的訛誤。由於他在治學方面嚴肅認真，對古史記載乃能作到“去粗取精，去偽存

真”。

一切事物都處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對一切歷史現象，必須對它的發展過程進行分析，才有可能掌握問題的實質。梁先生一貫比較注意對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研究，對於繁瑣考據則擯棄不取。當然，必要的考據還是不可缺少的；如若為考據而考據，則不免涉于末流。他經常談到：選定題目，從事研究，要從大處着眼；需要處理的問題，有的需要考證，但不要停留於考證。梁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從事研究明代賦役制度所選題目，範圍大者如一條鞭、糧長制和里甲制，小者如戶貼和易知由單，在研究過程中都經過詳細考證，最後都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聯繫在一起。這也就是他一向主張的從大處着眼。解放以後他所寫的有關明代賦役制度的論著，更加貫串着這種精神。

和嚴謹學風緊密相聯繫的，梁先生的科研工作還貫串着一套科學方法，特別是關於數字統計的整理和運用。研究經濟史，數字記載極關重要。尤其是長時期的統計數字，是進行研究的基本材料。梁先生有很多文章都盡量使用數字統計。如《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根據二十五史、歷代政書、各省方志、歷朝文集以及近人著述有關數字材料，進行了詳審的考核測算。中國史書所記數字，每互相歧異，梁先生則詳加考訂注釋。研究某一歷史事件，對有關數字資料進行科學加工，製成統計圖表，從數量變化考察其發展趨勢，這種方法極為必要。有的事物發展變化比較複雜，具體內容一時不容易掌握，則採用編年紀事法，按時間順序及地區進行排比，對某一事物的發展過程，地區間的差異，可一目瞭然。梁先生所著《明代一條鞭法年表》就是採取的這種處理辦法。這樣，從雜亂無章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條鞭法在不同地區間的發展變化，作出比較確切的論述。

梁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之所以能做出卓越貢獻，不僅由於努力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堅持嚴謹的治學態度，還由於他的堅韌勤奮。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同在四川李莊，他一年到頭幾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也因此多少影響於他的健康。我經常在星期天去找他談問題，我每次去，見他都異常忙碌，不是查閱書刊，就是寫文稿資料。有時他忽然問我：今天是星期幾。在他心目中只有工作而無星期日。

梁先生的勤奮還反映於對資料的搜集積累。他寫每一篇文章，幾乎要求把所有能找的參考書都進行查閱，而且對有關資料都親手摘錄。只要有一部比較重要的書籍還沒有看到，他決不輕易放過。如對所進行的明代土地賦役制度的研究，於正史、文集、割記和方志有關資料廣泛搜集摘錄，廣徵博引，進行比較。又如解放後所寫〈明代一條鞭法年表〉一文，查閱有關文獻達一千多種。

對有些專題，單靠正史、文集、方志等書往往是不夠的，還必須大量查閱原檔，搜尋原始實物，以彌補正史之不足。如關於明代戶貼的研究，根據戶貼實物，指出戶貼“不但是戶籍的根據，而且也是徵收賦稅的根據”。這樣，用“戶貼”彌補了史籍所忽畧的歷史事實。如關於易知由單的研究，搜集順治、康熙兩朝易知由單三百餘份，又從明代方志中查尋明代易知由單格式。這樣，結合其它有關記載，使明清兩朝推行易知由單歷史沿革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如關於明代黃冊的研究，利用不少檔案資料，闡述黃冊制度的內容，論證黃冊制度在明代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

特別是梁先生在其最後整理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中，付出了極其艱鉅的勞動。此書對由前漢至清末兩千多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加工。全書凡七十多萬字，主要是圖表、計圖

六個，各類表二百五十三個，有的表長達八九頁。參考書目數百種，當不下數千卷。每個圖表的製作，都經過精心設計和計算。書中所引用數據並非簡單羅列，而是對各家記載進行比較，於互相歧異之處加以考訂，探微索隱，務求詳實，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建國以來中國經濟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鉅著。這樣一部著作，工作之浩繁難以設想，充分表現了梁先生堅韌不拔、鏗而不捨的勤奮的治學態度。

梁先生以畢生精力從事中國經濟史問題的研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我在這裏概略的介紹，不可能包括梁先生科研貢獻的全部內容；由於個人水平的限制，所作評介也許還有不妥之處，請讀者指正。

梁先生在解放以前對黨就有較深的感情，如設法營救地下黨被捕同志，協助去延安的同志做聯繫工作；尤其是解放前夕，堅拒國民黨威脅利誘，反對去臺灣而留在大陸等候解放，表現了一個愛國學者的崇高氣節。解放以後，在科學研究方面力求理論聯繫實際，他的學術論著不愧為我國史學界一份珍貴遺產，在教學方面也做出了有益貢獻。這樣一位篤誠的學者，不幸過早地離開了人世，這是史學界的莫大損失。值得慶幸的是，他的論著經過中山大學歷史系老師們搜集整理，付出了辛勤勞動，能較快地和廣大讀者見面。論文集的發表，必將在學術領域產生良好影響，梁先生可以無憾了。李文治謹序。

一九八二年六月于青島療養院。